



《李國鼎口述歷史》、《我的臺灣經驗》到《李國鼎文集》

# 《李國鼎口述歷史》、《我的臺灣經驗》 到《李國鼎文集》

文字工作者  
蘇惠昭



李國鼎口述歷史  
康綠島著  
卓越世界文化 / 9006  
ISBN 9573031701 / 平裝

如果臺灣是一個故事，1949 年正是這個故事的轉折點之一。這一年，在國共內中節節向南方撤退的國民黨政府播遷來臺，並以維護治安之名，由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宣布全省戒嚴，限制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長達 38 年。

從人權的角度，1949 年以後到宣布解嚴的 1987 年，臺灣的故事是一則抗爭與順服、對立與融和的血淚故事。

從經濟的角度，臺灣的故事卻是一則從灰姑娘幻化為鳳凰的故事，而幾乎活過一整個 20 世紀，在 21 世紀的第一年，5 月最後一天與世長辭，享壽 92 的李國鼎先生是親手擘畫、參與並寫下故事的人之一，從各界在其生前死後為之加冕的封號如「臺灣經濟的建築師」、「沒有李國鼎，就沒有今日的臺灣」、「中華民國科技的伯樂」、「臺灣科技教父」、「心靈改革的先知先覺」以及「國之寶鼎」，我們不難理解國鼎先生與「臺灣經濟奇蹟」之間的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一對一的函數關係了。

2000 年是臺灣政治有史以來第一回合的政黨輪替，國民黨失去 50 年來的政權，但民進

黨綠色執政這一年多來，恰恰搭上全球經濟大衰退列車，除了被視為「升起的明星」的中國大陸，由於美國的不振，再加上九一恐怖攻擊事件的衝擊，接之而來的美國對阿富汗的復仇之戰，嚴重拖累了以美國為主要出口對象的亞洲國家，強權的日本與歐洲經濟亦雙雙向下探底，臺灣人民尚未適應新政府的思維與步調，財產已大幅縮水，失業率創歷史新高，企業紛紛外移，上海成了臺灣人奮進打拚的新冒險樂園，加上接踵而至的天災人禍，這樣的時候展讀卓越文化 1993 年出版，2001 年國鼎先生逝世後再版的《李國鼎口述歷史—話說臺灣經驗》，滋味委實萬般複雜。

《李國鼎口述歷史》是一部以國鼎先生口述歷史為骨架，以檔案及訪談資料為佐補，而以臺灣發展為主題的傳記，任職哈佛大學 Fairbank 研究中心的作者康綠島女士自 1992 年初開始進行國鼎先生生平的訪談與研究，當時國鼎先生雖已年高八十有六，卻以其驚人的記憶力以及無比的耐心提供了豐富詳實的史料，對傳記作者而言，這樣的傳主猶如寶山大海，取之不盡。

國鼎先生是南京市人，生於 1910 年，係一信奉「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進步家庭的最小兒子，九歲之前以其於私塾所習之左傳、四書、唐詩扎下中國學問的根底，特別喜歡左傳，之後進入南京高等師範附小接受杜威式的現代化教育，嗜讀小說，升上鍾音中學後「突然對讀書感到興趣」，並且展現了數學方面的稟賦，以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一位折不扣的「數理資優生」，這位資優生後來畢業於



中央大學物理系，活躍在「中華自然科學社」與「中國天文學會」，努力撰寫文章以推廣科普教育，他深信「科學救國」，曾經在科學刊物中這樣大膽放言：「中國之所以處處失敗，還不在於經濟的恐慌、政治的紛擾，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學術本身有毛病。」

1933 年中英庚款留學考試正式舉行（註：美、英兩國退還庚子賠款以發展中國教育文化），國鼎先生係隔年第二屆 26 名錄取生中之佼佼者，負笈劍橋大學研究核子物理三年，1937 年七七事變爆發，這位核子物理學家自此無心課業，於是束裝回國準備為國防空戰效力。

這應該是國鼎先生「科學報國」的第一聲，1937 到 1948 年，他在防空學校擔任機械員，也就在這時加入國民黨，一度赴昆明天文臺工作，又被延攬參與資渝鋼鐵廠興建，接之是中國造船公司，這也就意味著，當 1948 年國鼎先生受邀至臺灣造船公司時，他已然歷練豐厚，行政組織能力具足，全然不是一位書房和實驗室裡頭的科學家了。

國鼎先生在 1948 年決定定居臺灣，貢獻臺灣，而隔年大陸易幟，開始了他與臺灣的現代化、經濟發展休戚與共的命運。

國鼎先生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臺灣呢？根據溫世仁在《臺灣經濟的苦難與成長》（註：國鼎先生特別為該書寫了一段前言）的描述，五〇年代的臺灣就是一個「貧窮」，國民所得低於 80 美元，出口金額一億美元，外匯存底零，小孩沒鞋穿，肚子永遠填不飽，人口八百萬（六百萬原來住在臺灣的人民，兩百萬隨老蔣總統而來的軍隊），加上與共黨一觸即發的對峙，唯一的「利多」是 1950 年開始，每年計一億美元的美援（註：「美援時期」至 1965 年止）以及勤奮樸拙的人民。

老蔣總統抓軍事政治的權，但自承無知於經濟，副首陳誠手下的一批技術官僚便成為臺灣經濟發展的擘畫師，當時的財政部長是嚴家淦，楊繼曾為經濟部長，尹仲容負責管理臺灣區的公營事業，理工科出身的三人組

是國民黨政府最早的財經決策核心，尹仲容尤其得老蔣總統信任，尹的經濟思想取法日本的明治維新，再逐漸發展為「計畫式的自由經濟」，贊成工業民營化，但反對自由放任，後來擔任工業委員會召集人，李國鼎為三位專任委員之一，臺灣「進口替代工業」、「工業民營」的工業發展策略便是從尹仲容手中撒出去的種子，1962 年尹仲容去世，追隨其經濟思想的國鼎先生以「臺灣經濟發展的領港人」蓋棺論定這位亦師亦友的前輩。

一個國家的發展從來不會有偶然，來到六〇年代的臺灣，它的代詞就是「加工出口區」，全世界的第一個加工出口區為何出現在臺灣？這自然是尹仲容、李國鼎評估環境後決意大力推展外銷的結果，「出口第一」是國鼎先生在 1956 年喊出的口號，又兩年他奉調為美援處秘書長，這才算正式進入財經決策的核心，翌年八七水災，死傷慘重，農作損失無算，而國鼎先生因災後復舊善後有功，獲老蔣總統召見，此後便成為老蔣總統眼前的紅人。

「出口第一」帶來了經濟的成長，也引起新興亞洲國家如韓國的模仿效尤，不過這還只是個開端，如果我們回想六〇、七〇年代，應該會記得「人人儲蓄」這件事，連中國小生也人手一本郵政儲金簿，奉行節儉為最高美德。「儲蓄」的背後或者有國民性格的因素，更大的推動力量其實是政策的強迫與鼓勵，發展經濟需要錢，外資除外，政府更加渴想的是拿老百姓的儲金去投資，儲蓄多消費就相對減少，人民雖在消費上犧牲，但國鼎先生認為，就長遠利益來看，為了加速經濟發展，人民的犧牲是必須的，等社會總體財富增加了，餅做大了，再來增加私人消費，改善生活。

「臺灣工業發展需要四方面同時努力，加速資本形成、培植企業家、改變社會與文化環境、追求科學知識」這是國鼎先生在「論臺灣的工業發展」所作的四大提示，時為 1961 年。1977 年，國鼎先生應邀到菲律賓演講傳



播臺灣發展經驗時，便呼籲菲律賓政府要鼓勵國民節約儲蓄，他說：「一個國家的發展，如果不靠自己儲蓄的話，一天到晚要靠人家低利貸款，那是行不通的。」

政策讓臺灣在發展過程中免於外債的負擔，但也因為政策發展工業，農民卻在這個過程中被犧牲了，研究臺灣經濟史的楊照在「經濟奇蹟不是奇蹟」一文中指出，經濟政策上，農民是被層層剝削的一群，農民被課稅、農產品價格受控制、不等價強迫交易肥料穀物、低估糧價的實物徵收種種，國鼎先生不是不明瞭這些狀況，「在我們最艱苦的歲月」1965年他在一場對農學會的演講中便語帶感激的說了「農業為我們生產了充足而廉價的糧食與工業原料，為我們賺進了迫切需要的外匯，提供了極端缺乏的工業資金，並為我們正在發展中的經濟提供了適當的市場」。「但我們的社會都還在為這樣的歷史歪斜結構付出代價」楊照說。

經濟發展犧牲農民的同時，也犧牲了基本的公共建設。

那年國鼎先生擔任經濟部長，1969年轉任財政部長，轉而研究財稅問題，其間又推動幾項重大經濟政策，一是透過家庭計畫來控制人口，「三個孩子恰恰好」、「兩個孩子不嫌少」，當時臺灣人口已增加到一千二百萬，而就業機會每年只增加二十萬個；一是將普通高中與高職學校的比例反轉以切合經濟發展需要；另一是改革賦稅並革新稅務行政，開始了臺灣稅務的電腦化與稅務稽核。

一般認為，外匯改革（一比四十固定匯率）、十九點財經措施與獎勵投資條例是三大臺灣經濟法律政策基礎，而包括多條稅務優惠條款的「獎勵投資條例」更是在國鼎先生全力推動下，使臺灣經濟快速成長的沖天炮，臺灣經濟從此進入長期出超年代，這是七〇年代。

1972年老蔣總統隱退，1975年去世，1975到1988年是為蔣經國時代。根據國鼎先生的說法，老總統信任他，經國總統對之卻疑慮

頗深；老總統頭腦好觀念新，肯接納他的意見，經國總統對財經不甚了解，卻很固執，而且一人決策，比方1973年宣布的十大建設，多數財經官員就事前毫不知情。因著與國鼎先生之間財經理念的分歧，經國總統遂於1976年發佈費驥為財政部長，任命國鼎先生為不管部會政務委員，有架空的意味，旋又委其擔任新成立的應用科技研究小組召集人，這個職務預告了臺灣工業的升級，也為國鼎先生贏得了「臺灣科技教父」之名，「臺灣錢淹腳目」的時代正式登場

富裕起來的臺灣仍舊必須與世界一起前進，而世界已經逐漸進入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所謂的《不連續的時代》，臺灣的下一步呢？「全力推廣計算機有效應用，以改變經濟形態，提高實力」，「厚植資訊技術能力，並拓展其為輸出產業」1980年，國鼎先生為臺灣資訊工業的目標與策略定調。

1980年以前臺灣並沒有資訊工業，「科學技術發展方案」是國鼎先生在當時行政院長孫運璿支持下於1979年提出，之後他便馬不停蹄地往返海內外，邀請外籍科技顧問、召開全國科學會議，制定培養國內科技人才計畫等等，資訊工業策進會也在此時開始運作，1981年新竹科學園區成立，而為延攬海外人才，國鼎先生親自出馬懇談，在幾個星期內跑遍美國四大城市，一共約見了兩千名華裔科學家，1986年終於說服當時行政院長俞國華成立臺積電（TSMC），「臺灣半導體之父」張忠謀雖是在工研院董事長徐賢修「三顧茅廬」的盛情邀請下決定來臺服務，但這和他個人與國鼎先生的交情亦不無關係。

1988年國鼎先生宣布退休，改聘為總統府資政，距離他從臺船一路走來，剛好四十年，總結這四十年來的臺灣發展經驗，國鼎先生認為就是一個從務實哲學出發，先發展在日本殖民下已有基礎的農業，進而轉移到進口替代工業，而國際石油危機時期正好經國總統宣布十大建設，促使臺灣經濟及時復甦，免於與國際的衰退共舞，八十年代則開始發



展科技密集工業，躋身亞洲四小龍，而在臺灣走向富裕的同時，篤信基督教的他又猛然回頭反省臺灣這埋頭苦幹的四十年「是不是錯了方向」，否則人與人之間的關愛、善意、信任因何蕩然？公共道德與秩序因何不存？這是現代化社會的危機，恐怕也是比貧窮、公共建設落後或者失去了青山綠水更大的危機，傳統五倫之外以群己關係為核心的「第六倫」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國鼎先生提出來，「公德式微的直接後果是敗壞社會的秩序、和諧與安寧，使生活素質降低；間接後果是損傷社會作為一個促進個人福利的工具的有效性最後終於阻礙經濟的發展」、「文化原為一個整體，因此一個國家、社會不可能長期保有進步的經濟和落後國民」。

九〇年代的臺灣不僅只是鳳凰，而且是鳳凰中的鳳凰，驕傲而自戀的鳳凰，國民所得飆到一萬多美元，股票漲到大家來不及數錢，除了要考臺灣史的學生，多數人已不聞不問這一路是如何走來，所經歷的苦難以及關鍵的轉折點，彷彿一切從天而降，是上天特別眷顧這個「自立自強」的小島，但到了一定時候，又要來回收它。

1999年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整理了國鼎先生歷年來的講稿、文章與報告，編纂成十四冊的《李國鼎文集》，分別是《臺灣經濟高速發展的經驗》、《臺灣經濟發展背後的政策演變》、《臺灣經濟發展中的科技與人才》、《臺灣的人力資源與人口問題》、《臺灣財政金融與稅制改革》（上下冊）、《臺灣的對外經濟合作與加工出口區》、《臺灣的經濟計畫及其實施》、《臺灣的對外技術合作與外資利用》、《臺灣的工業化》、《臺灣的企業經營與管理》、《臺灣的現代農業》、《臺灣的都市發展與公共事業》、《世界經濟的考察與研究》到《臺灣的高新技術與現代化》，無一字句不是一名「經建老兵」（註：國鼎先生自況）對國家最深情的擘畫藍圖與建言，又兩年不到，臺灣陷入前所未有的經濟風暴，創新高的失業率和創新的負經濟成長，國鼎先生就在這樣的時刻仙逝，這是一個不可能忽略的警訊，提醒我們奇蹟不是從天而降，奇蹟裡也必然隱含著反挫的因子，怎麼樣站起就可能怎麼樣跌倒，除非我們謙遜，懂得反省，懂得關愛，也除非我們理解到成長的極限。風暴中當我們看不清楚前方的時候，有人大聲吶喊起來：「我們為什麼不再有李國鼎？」。

國鼎先生的故事已經結束，蓋棺論定，臺灣的故事還在繼續。「今天我求主：使我把正義，放在功利之前；使我把別人，放在自己之前」這是國鼎先生最愛讀的禱詞，我們也祈禱正在為國家做決策的官員，聽見它，履行它。



· 李國鼎文集